

「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赤化南部非洲的工具

楊逢泰

也許「民族解放運動」正在南部非洲為爭取自由而戰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運動所要爭取的自由，決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重視的自由。莫斯科已將自由的意義作典型的歪曲，西方國家竟也參加「解放南部非洲」，而不瞭解他們在事實上正在支持共產主義和推動莫斯科赤化全世界的運動。

莫斯科戰略的「中共化」

回憶一九五七年迦納獨立時，尼克森以美國副總統身份參加獨立慶典後，順道訪問了六個非洲國家，回國後向艾森豪總統提出報告，指出共黨滲透的危機。他說：「非洲是國際共產黨運動的一個優先目標，我獲得清晰的印象：共黨首腦們認為今天的非洲對於他們征服世界的設計，其重要性正如他們在二十五年前認為中國的重要性一樣」。^①遺憾的是，政治家們似乎並未記取歷史的教訓，忘記了自己所說的話，甚至並不相信敵人坦白的招供。因此，歷史的一再重演，可在今天的南部非洲找到另一個例證。

列寧是「世界革命」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他運用「民族解放運動」作為高度有效的攻勢工具，遠勝過大規模的戰爭，因為「民族解放戰爭」自革命的基地向外推展，而不會危害到核心地區——蘇俄。此一「革命的過程」已經過許多里程碑，在全世界已經獲得了動力。^②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第三世界逐漸變成莫斯科的革命戰爭的焦點所在，次開發地區被認為是「民族解放戰爭」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戰場。列寧的所謂「剝削國家」和「被剝削人民」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的理論，重新獲得肯定，蘇維埃的大計劃就在第三

註① Rupert Emerson, *Africa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c. 1967, p. 7.

註② Dirk Kunert, *The Kremlin, The World R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Occasional Paper,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77), p. 1.

世界發動起來，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被利用作為工具。^③

俄共第二十屆黨員大會後，黑魯雪夫一方面強調「和平共存」為基本政策，一方面宣揚循「國會途徑」可以作為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方法，而毛澤東認為「和平共存」及「和平轉移」嚴重的歪曲了馬列主義的教條^④。因此雙方開始論戰，北平認為「和平共存」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是適合的政策，可是堅持在「被壓迫民族」和他們的「壓迫者」之間決不可能有「和平共存」。^⑤事實上，一九五六年所公佈的「和平共存」的政策具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構面—即所謂「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五六年所舉行的共黨代表大會和國際共黨和工人黨會議中所通過的一連串決議案將「和平共存」的國際構面明白的建立起來。在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的宣言中，世界共黨的體系被認為是「解放國家中獨立的民族發展的可靠盾牌」，而「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殖民地人民和屬國從帝國主義壓迫中解放的戰鬥中已有了決定性的貢獻」。其後克里姆林宮御用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者評論」（World Marxist Review）將「和平共存」肯定為「國家之間關係的一項原則」，不僅不限制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發動階級戰爭，而且，相反的使此項鬥爭成為可能，因為「和平共存」可以「保護人民和國家不受國外帝國主義侵略力量的干涉」。其時蘇俄的軍備尚無力量來執行莫斯科的意志^⑥。

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當美國正在積極結束東南亞的戰爭之際，蘇俄的注意力轉向非洲，從事於組織工作，為未來民族解放戰爭作積極的整備，將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沿岸地帶劃為政治—軍事戰場，定為莫斯科所必須控制的範圍，而在非洲內陸挑選爭取的目標。

一九六九年，蘇俄在蘇丹首都喀土穆召開「支援南部非洲和葡屬殖民地解放運動國際會議」，由蘇俄的兩個外圍組織，「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和「世界和平理事會」主辦。與會代表有南非的非洲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羅德西亞的辛巴勒威人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坦南非洲的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以及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cao de Angola）等。在喀土穆會議中，莫斯科加緊了對解放組織的控制，在意識形態和組織策劃方面也獲得了加強和協調。^⑦

在喀土穆會議中，親北平的幾個解放組織—泛非洲主義大會黨（Pan-Africanist Congress）、辛巴勒威非洲國民同盟（Zimbabwean People's United Party）和

註③ Dirk Kuner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Afro-Asian Ocean Region, Special Study,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1977), p. 7.

註④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9.

註⑤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35.

註⑥ Dirk Kuner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p. 7.

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 (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 和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一會發表一項聲明，攻擊此一會議企圖「控制葡屬殖民地和南部非洲的解放運動，以促進蘇俄和美國的合作，共同統治世界」。⑧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蘇俄將其在亞非次開發國家內所採取的防禦性途徑轉變為攻勢的姿態，蘇俄對第三世界的戰略已經「中央化」(“Sinocised”)。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蘇俄對世界力量的相互關係作現實的評估後，曾經拒絕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的好戰姿態。其後，蘇俄的軍事力量已臻強大，使政治局具有了世界強權的意識，因此對第三世界的戰略，反映出毛派的戰略思想，而且積極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以暴力奪取政權。

莫斯科赤化第二世界的工具・「民族解放運動」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認為，在這個時代有三個強大的力量，即「民族解放戰爭」、「國際工人階級」和政治局指揮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因為這次會議為俄共所籌備，所以通過的決議案反映俄共的官方觀點。大會中所通過的行動綱領精確的規定「民族解放鬥爭」為傳播革命主張的主要工具，布里茲涅夫要求大會代表們注意：適當的疏導「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浪潮」是世界革命同志們的最重要的任務。

俄國共產黨和布里茲涅夫將非洲大陸視為將來最重要的發展地區和最重要的戰場，而南部非洲提供了「使帝國主義蒙受嚴重打擊」的最佳機會，美國被指定為「帝國主義的憲兵」，為「解放運動不共戴天的敵人」。如果「帝國主義的防波堤」削弱，則革命運動的浪濤將洶湧澎湃，勢不可當。⑨

「世界馬克斯主義者評論」總編輯查洛多夫 (Zarodov) 是俄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曾將美國指定為蘇俄發動革命攻勢的最後目標，美國構成了「現代帝國主義的主要基地，反動和侵略的中心，新殖民主義的支撐點。」他所主持的「世界馬克斯主義者評論」曾經舉辦一連串的國際性會議，並且達成了下列幾點結論和觀察：

- 一、當代的局勢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偉大的潛力，對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展開他們的鬥爭。
- 二、聯合國機構和非洲團結組織所宣佈的「民族」、「人道」和「民權等主張僅能作為在非洲次大陸的革命運動從事最高冒險

註⑦ Ibid., P. 23.

註⑧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87.

註⑨ Dirk Kunert, *The Kremlin pp. 1-2.*

的策略。此項最高冒險就是將南部非洲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作徹底的轉變，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統治強置於廣大的羣衆；而「黑人多數的民主政治」僅能作為發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起飛階段。

三、征服非洲次大陸是邁向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一站。

四、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是對「帝國主義」從事全球鬥爭的三個主要革命工具之一。
五、「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必須在從「民族」邁向「社會」自由道路的非洲國家內，連根帶葉，徹底摧毀。
六、美國被特別指定為最後摧毀的目標。為加速此項過程，必須用武力將所有美國影響力的痕跡從黑色大陸上除去。
七、克里姆林宮的戰略家充份瞭解非洲原料使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的輪軸繼續旋轉的特殊重要性。^⑩

印度洋、戰略資源和民族解放運動

蘇俄的領導階層將控制戰略物資視為世界權力平衡或衝突的一部分，莫斯科在印度洋高原地區所採取的資源策略與其鼓吹「民族解放運動」，具有密切的關係。遠在一九五七年，蘇俄經濟作戰專家陸軍少將賴可夫斯基（A. N. Lagovskiy）便曾指出：西方幾乎完全依賴着各種重要的原料。某些重要戰略物資的缺乏，是西方權力連鎖中「脆弱的一環」，他敦促克里姆林宮加緊利用這種弱點。^⑪

當蘇俄正忙於採取外交行動，擴充軍備之際，其學術界亦在忙於對非洲資源的研究。一九五六年，蘇俄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設立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專門研究當代問題，其中有一組致力於「已解放和未獨立國家」的研究^⑫，一九六一年，蘇俄當局將原屬於科學院的歷史學部的非洲研究所，改隸於該院的經濟學部，這是配合其研究非洲資源的措施。^⑬

為了支持其爭取原料的戰略，蘇俄正無休止的在亞非戰場尋找海空基地，作為蘇俄控制世界能源和物資的踏腳石，南部非洲蘊藏著世界上極重要的資源，當然是莫斯科的主要目標，蘇俄的范納曼（Peter Vanneman）在其所著「蘇維埃在南部非洲和印度洋的國家安全政策·莫桑比克的個案」一文中指出：「非洲在許多種原料的蘊藏和產量上，都居世界第一位，非洲蘊藏著許多稀有金

註⑩ Ibid., pp.9-10.

註⑪ Dirk Kuner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p. 11.
註⑫ Elizabeth Kridl Valkenier, "Recent Trends in Soviet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July, 1968) Vol. XX, No. 4. pp. 644-45

註⑬ David Morison, The U. S. S. R. and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71.

屬；而極大多數集中在南部非洲，專家們說（西南非）有足够的資源供應大陸一半的需要……在桑比亞流域發現有大量煤、鐵、鋼、鑑等礦藏」。

因此，超級強國中的任何一方在印度洋取得政治—戰略的優勢，即將為失敗的一方招致全球性的災難，在世界事務中，地理戰略區域扮演戰略的角色，而地理政治區域則扮演戰術的角色，如果蘇伊士運河完全在莫斯科支配之下，則競爭的地區將直接轉移到非洲，使靠海運的歐洲處於極為危險的地位。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蘇俄最後決定利用其機動的海軍力量，在第三世界促進蘇俄的利益，並且遵照一九七一年共黨第二十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和平綱領」中所設計的長期政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積極的行動，因此在美蘇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戰略平衡，雙方均具有「種族滅絕的報復性力量」。

湯姆遜（Sir Robert Thompson）在「世界戰略中的革命戰爭」一書中認為：在種族滅絕報復性力量的時代中，革命戰爭作為政策的政具，其主要利益在避免直接對抗，美蘇兩強能參與敵對雙方而不致有直線昇高的危險，因此，就共黨國家而言，「革命戰爭是一種低度冒險的戰爭」，符合列寧的遺訓。

蘇俄的海軍現在已形成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可以直接支持莫斯科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革命戰爭，蘇俄海軍上將高希可夫（Admiral Gorshkov）強調，海軍應被認為是能在和平時期運用的軍事因素，以及作為保衛一國海外利益的兵種。^⑭

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上校（Captain Mahan）曾經說過，「誰控制了印度洋，誰就能支配亞洲。此一海洋為七洋的鎖鑰。在二十一世紀中，世界的命運將決定在印度洋的水域」。^⑮蘇俄作為一個海權國家，其海軍侵入印度洋區域，從非洲東海岸、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次大陸到東南亞，如果從克里里姆林宮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活動的範圍以及它決心利用此一廣大地區動盪不定的情況來衡量，蘇俄海軍的活動，似已到了具有脅迫的程度。

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終極目標·普利托里亞

葡萄牙殖民主義崩潰以後，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了兩個「人民共和國」使南部非洲的權力均衡發生了劇烈的改變。目前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羅德西亞。

莫斯科認為羅德西亞是通往普利托里亞道路上最後一個障礙，南非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的喉舌

^⑭ Kuner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pp. 25-34.

「非洲共產黨」(The African Communist)說：「在辛巴勃威（即羅德西亞）的突破，其重要性已超過了邊境，移去了南非阻止解放部隊和獨立非洲警戒線上最後的一塊石頭」，從南非共產黨喉舌所發出的這些話是莫斯科想法的一項可靠的反映，也是對西方適時的提醒。與南部非洲有關的問題不僅是黑人多數統治，而是共黨統治的問題。莫斯科一再的重申它將給予非洲完全的支持。^⑯根據南非學者的研究，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組織」在事實上均有密切的關係，充當莫斯科顛覆南非共和國的工具，對南非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民族解放運動」有兩個，茲分述於後。

一、南非共產黨

南非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成立於開普敦，是非洲大陸上第一個共產黨，也是世界上最早共產黨之一。它的成立有深長的意義，從莫斯科的觀點看來，這是南非所有進步和民主力量在對帝國主義鬥爭中團結起來的基礎。南非共產黨堅決的為南非所有工人的團結，以及為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戰鬥^⑰。

南非共產黨自認是與「帝國主義和壓迫」戰鬥力量的先鋒，一九五〇年被南非政府查禁以後，該黨馬列主義者的核心份子即企圖依照南非的現實情況，尋找其行動的路線，繼續在鄉間從事地下活動。^⑱

一九五九年十月，南非共產黨在倫敦創辦「非洲共產主義者」刊物，為其喉舌，以傳播馬列思想，並公然自認是「整個大陸馬列主義思想的論壇」。它要求全非洲的讀者將此一雜誌作為討論小組的基本資料；並希望該刊「變成許多地方偉大的和重要的共產黨的奠基石。而共產黨將會拯救你們的國家」。總之，此一雜誌的目標在作為整個熱帶非洲的國際決策性機構和一個「集體的組織者」^⑲。

在意識形態方面，南非共產黨是莫斯科取向的。該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二月發表的聲明中稱：「本黨……係受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的影響和指示。而馬列主義「一再的證明為中央的革命意識形態」，因此他們的意識形態表現在形式上的，是馬克斯主義的術語和口號，表現在內涵方面的則是馬克斯主義者的辯證法。

南非共產黨的鬥爭，遵守莫斯科的指示，並不以在南非的最後勝利為其終極目標，而是邁向「最後消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也就是美利堅合衆國——的一個重要步驟，南非僅被視為此一戰鬥的橋頭堡而已。

註⑯ Jan du Plessis, Soviet Strategy Towards Southern Africa, Sundy Report, No. 1, (April 1976). p. 6.

註⑰ Morison, op. cit., p. 112, and Jan du Plessis, South Africa: The Link of Terror, Study Report, No. 7 (October 1977), p. 6.

註⑱ Jan Du Plessis, South Africa: The Link of Terror, Study Report, No. 7 (October 1977) p. 5.

註⑲ Zbigniew Brzezinski (ed.), *Africa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88.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南非共產黨代表馬克士（J.B. Marks）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黨和勞工黨大會」（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上演說時稱：

我們奮鬥的性質已經告訴我們革命者國際主義的基本教訓。我們從經驗中充份瞭解・我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與同樣敵人作戰的我們袍澤所從事鬥爭是一體的……

我們的鬥爭不僅是為我們的解放，這同時也是我們為完成國際責任的共同作戰的貢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南非共產黨多年來堅持和努力呼籲作為全世界反帝先鋒特遣隊的國際共產運動團結起來的原因，我們運動的團結是集合所有向帝國主義、戰爭、殖民主義和剝削作戰的戰友們的鎖鑰。

如果從南非共產黨在南非為其所服膺的國際主義而鬥爭所採取的戰術來判斷，可以獲得一個非常明晰的結論，莫斯科決不能也不會以黑色民族主義為其在非洲的最後鵠的。黑色民族主義只是達到真正目標的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而已。該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所發表的聲明書中說：

本綱領……規定黨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爭取民族解放統一陣線的勝利。將被壓迫的和民主人民的各階層團結起來進行民族民主的革命。此一革命的目的在摧毀白人統治，其主要內涵將是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我們認為此一革命是邁向社會主義的南非的必要條件和鎖鑰，是共產黨最高的目標。

「不容忍」是俄共和南非共黨的品質證明。在民族解放的掩護下，只有一個意識形態——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蘇維埃馬克思主義；而絕不能容忍其他意識形態。^②

二、非洲國民大會黨

非洲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歷史比南非共產黨更久，成立於一九一二年，其主要目的在促進黑人的政治發展，南非共產黨主席馬克士於一九三七年擔任非洲國民大會黨的書記長之後，這兩個政黨在組織策略和理想方面極為密切。在鬥爭的過程中，南非共產黨變成了國外的一翼，非洲國民大會黨變成了在國內活動的一翼。而莫斯科宣稱・非洲國民大會黨是南非黑人的真正代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南非最高法院檢察長根據「恐怖主義法案」審訊十一名男人和一名婦女時宣稱・非洲國民大會黨是南非共產黨的外圍和掩護，用作工具來達到它的目標，此一事實使黑人的民族革命隸屬於馬列主義，非洲國民大會黨革命成功的實際結果，將是俄羅斯馬克斯主義者的政府取代現在的政府。

南非共產黨也公開招認與非洲國民大會黨的密切關係。一九七六年「非洲共產主義者」在六十四期中稱：「很明顯的，像我們這樣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扮演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一方面是一個獨立組織，一方面是非洲國民大會黨所領導的解放陣線的一部分……經驗已經一再的證明：在我們的革命中，本黨和民族運動的聯合行動使我們的影響力相輔相成，最能符合人民的利益。」「非洲共產主義者」在一九七七年的第六十八期中又說：「作為人民合法的羣衆組織和我們的革命先鋒，非洲國民大會黨及其盟友南非共產黨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在本質上是基於統一的目標。」

南非學者的結論和忠告

目前，南非共產黨和非洲國民大會黨雙方領導階層所協調的戰術是：故意的在南非製造動盪不安的情勢，使外界獲一印象，即南非政府的「鎮壓措施」已不可避免的引起被壓迫人民對壓迫者的「自發自動的反抗行動」。在另一方面，他們吸收人員，訓練戰鬥幹部，準備作武裝鬥爭。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七一年發佈的聲明書中說：「非洲國民大會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們專心一志招募人員和訓練作戰幹部，這些戰鬥人員和幹部已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進入行動地區，開始有計劃的在全國進行破壞活動，準備武裝戰鬥的過程已經開始」。^②

南非共產黨雖然否認它已經「控制」了非洲國民大會黨的宣傳，說它無意控制和支配任何其他組織，但很明顯的，該黨和非洲國民大會黨在戰術和戰略上有很多是一致的。共產黨以馬列主義為基礎，認為解放非洲人民是與種族隔離和白人統治以及為自由和民主的南非而鬥爭的主要內涵。^③

對於南非，蘇俄採取了一種雙管齊下的攻勢戰略：南非共產黨在莫斯科指導下，作為外部局勢的控制者，在南非內部的局勢，則依賴南非共產黨的解放陣線——非洲國民大會黨。不幸的是，莫斯科以及西方許多人士均宣稱：非洲國民大會黨是南非人民真正的代表。^④

在南非境內，蘇俄有兩個選擇的途徑，來促成南非政府的崩潰。

第一個途徑在於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黨，該黨喉舌——「非洲共產黨」於一九七六年報導稱：「我們的解放陣線在革命努力的每一個部門加強它的工作比以前更為有決定性的作用。它必須……在工人、農民和青年……之中鼓勵組織和抵抗。比以

註^① Ibid., pp. 7-9.

註^② Morison, op. cit., p. 113.

註^③ Plessis, Soviet Strategy Towards Southern Africa, p. 7.

往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表現我們有發動和維持有形武裝對抗的能力」。一九七四年德本（Durban）黑人工人的罷工使蘇俄獲有深刻的印象，因此，莫斯科更為強調利用南非黑人工人的戰略。

第二個途徑在目前仍然非常含糊。可是如果適當的注意布里茲涅夫在二十五屆共黨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仍可得其端倪。在那次會議中，他說：「同志們！本黨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非常廣泛而種類繁多，在釐定我們外交政策時，也許地球上沒有一個角落，其情況的發展不在我們考慮之中」。

布里茲涅夫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蘇俄的戰略能運用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同時，短程的戰術在事實上是取決於該特定區域內的政治機會。目前，蘇俄對南非的戰略是由南部共產黨和非洲國民大會黨來貫徹的。^②

南非學者們的結論是：西方不應犯下錯誤，而將共產黨侵犯南非視為是以消滅種族隔離為目的的運動，實際上，莫斯科認為對南非的攻擊，是全世界襲擊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南非的陷落只是此一世界性攻擊的一個中間階段而已。

莫斯科不會在南部非洲容忍危害其外交政策的目標或者援助其共黨盟邦的任何和平行動和創議。

南部非洲共黨力量的結盟殊為明顯。南部共產黨正在執行莫斯科的指示；而非洲國民大會黨正被利用將共產主義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帶進南非。

南部非洲年輕的馬克斯主義國家——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共產黨解放南非的跳板，非洲國民大會黨決不能被認為是南非黑人的發言人，因為馬克斯主義國家和非洲國民大會黨以及西南非人民組織等的論調，已經完全變成莫斯科電台的聲音。

也許「民族解放運動」正在南部非洲為爭取自由而戰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自由決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重視的自由。莫斯科已將自由作典型的歪曲，西方世界竟也參加「解放南部非洲」，而不瞭解他們在事實上正在支持共產主義和推動莫斯科統治全世界的運動。^③

註① Ibid., p. 9.
註② Plessis, South Africa: The Link of Terror, p. 14.